

巴赫金著

哲学美学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巴赫金 著

哲学美学

晓 河 贾泽林 张 杰 樊锦鑫 等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998 年 · 石家庄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

钱中文

副主编

白春仁 晓 河

委 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白春仁 李兆林 钱中文 晓 河

哲学美学

钱中文 主编

晓 河 贾泽林 张 杰 樊锦鑫 等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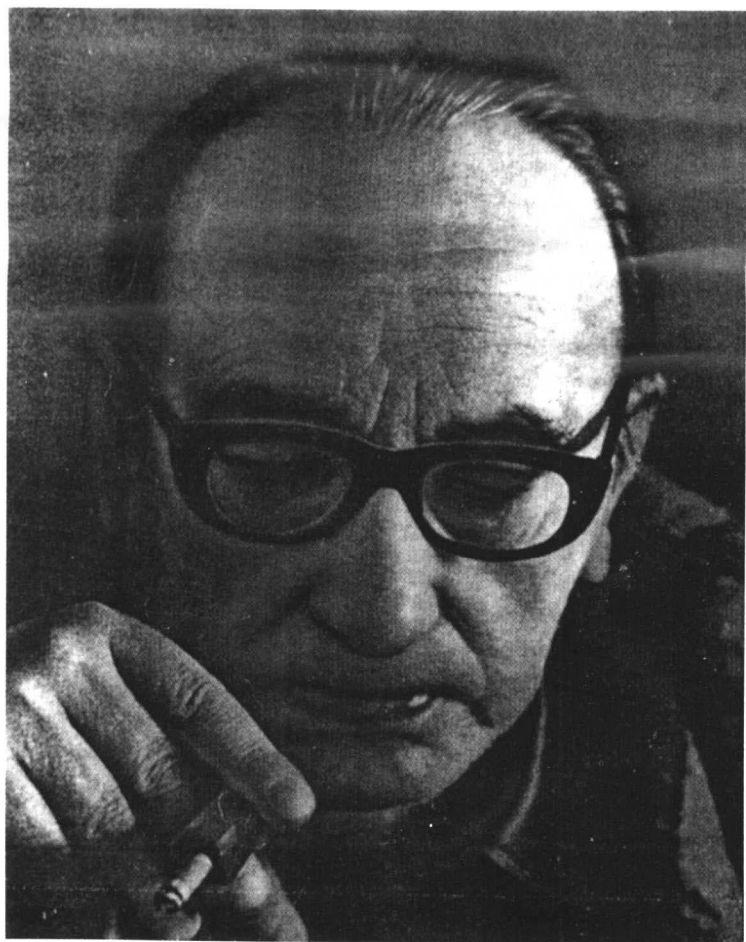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7.875印张 400千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-3000

定价:25.00元

ISBN 7-5434-3122-X/B·17



巴赫金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representing the name 'Mikhail Bakhtin'.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, with a prominent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top and a long, sweeping tail that extends to the right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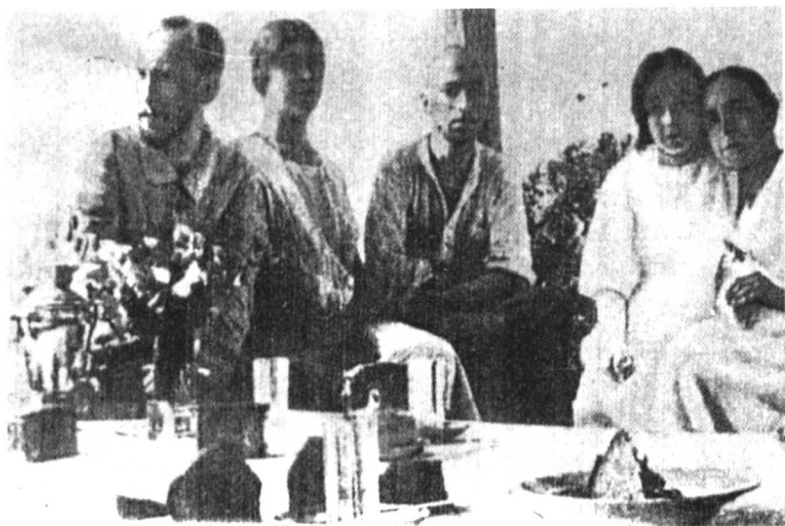
青年时期的巴赫金

巴赫金在涅维尔 1919 年





前排左起：巴赫金、尤金娜、卡纳耶夫、蓬皮扬斯基和梅德维杰夫，
后立者为沃洛希诺夫夫人与巴赫金夫人。1924～1925 年冬，列宁格勒



左起为巴赫金、卡纳耶夫夫人、B. 鲁戈维奇、巴赫金夫人、A. 鲁戈维奇。

1925 年夏，彼得宫

理论是可以常青的

——论巴赫金的意义

钱中文

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，前苏联的巴赫金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。

1928年末，他因在友人圈子里做过有关康德等人哲学思想、宗教的报告而被捕。而在1929年，他的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》出版，卢那察尔斯基还就此书写了评论。同年，巴赫金未经起诉、审判，就被判刑五年，经人营救，未往死亡地带发配，而被流放于北哈萨克斯坦的边区小城库斯坦奈。可1930年出版的《托尔斯泰文艺作品全集》第11、13卷，大约由于来不及清除其影响，还收有他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戏剧作品和分析《复活》的长篇序言。其后自然命途多舛，销声匿迹于文坛，有三十余年。

六十年代初，65岁高龄的巴赫金“时来运转”，竟被人发现了。于是旧作修订再版，多年被束之高阁的文稿出版问世，其“对话”思想、“狂欢化”理论立刻活跃了苏联文艺界，并不断发生争议；介绍到西方后，却是引起了阵阵轰动。以后，随着大部分写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哲学、语言学、美学著作不断出版，巴赫金声誉日隆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来，

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,历久不衰。表现为世界各国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他的学说,而且,本世纪似乎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享有像巴赫金那样的荣誉,每两年一次召开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;并有两本杂志专门讨论其学说,一为英国出版的以巴赫金提出的对话思想命名的杂志《对话》;另一为白俄罗斯出版的探讨巴赫金思想的杂志《对话、狂欢、时空体》。巴赫金将与二十世纪其他伟大思想家比肩而立,他在哲学、哲学人类学、语言学、符号学、美学、诗学、历史文化学等方面卓有建树,并在这些领域将发挥着持续的影响。据1983年美国学者提供的资料,六十年代下半期至1982年,各国学者就巴赫金思想撰写的著述约有120种之多^①。如今又已过了十五年,有关巴赫金的专著、论文恐怕已难以统计了。

巴赫金的被三次发现

米哈伊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巴赫金,1895年11月17日(新历)出生于奥勒尔的一个走向破落的贵族家庭,父亲是一家银行的高级雇员。巴赫金幼时生活尚称优裕,但患有致命的骨髓炎。后来他在奥勒尔的维尔诺中学念书,七、八年级时随父亲去敖德萨,在那里的敖德萨中学就读,随后进了诺沃罗西斯克大学。巴赫金自幼在家学习法语、德语,他平常用德语思考,德语几乎成了他的第一语言,在中学又学习了拉丁语、古拉丁语,后又掌握了丹麦语、意大利语等。

^① 据美国学者D. 方格尔在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“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”上提出的材料。

巴赫金自小聪慧过人。他迷恋文学、哲学，酷爱现代诗歌、象征派诗歌，以及普希金、波德莱尔、维亚切斯拉夫·伊凡诺夫的诗歌；诗歌甚至散文过目成诵。少时就阅读德文原版哲学著作，12岁至13岁时就阅读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。据巴赫金自己说，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首领赫尔曼·柯亨的著作《康德的经验理论》，对他“影响巨大”，并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；1915年转到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读书。1918年大学未曾毕业，便离开了彼得堡，南去涅维尔小城，在该市中学教书，并在那里度过了饥荒的年头。1919年9月，在当地出版的《艺术节》上发表短文《艺术与责任》。1920年去了维捷布斯克市，在该市的师范学院任教，讲授文学课程，并在维捷布斯克音乐学院讲授音乐史和音乐美学。革命后的维捷布斯克，未受战争影响，所以当彼得堡发生饥荒时，这里供应仍很充裕，于是便在这里汇集了彼得堡来的许多文化界的名流，创办了音乐学院、艺术学院、交响乐队等；一时维捷布斯克文化事业大为发展，在这里巴赫金一直待到1924年5月。在1921年给挚友M. 卡甘的信中说：“这时期我主要地从事语言创作美学”^①。这时巴赫金写了《文学作品的内容、材料与形式问题》、《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》、《论行为哲学》等。1924年5月后，巴赫金来到了首都，其时彼得堡已更名为列宁格勒，他一直待到1929年。在这期间，他的好友纷纷云聚周围，其中有文学与外国文学知识极为博学的蓬皮扬斯基，有音乐家、音乐理论家沃洛希诺夫，文艺理论家梅德维杰夫，钢琴演奏家尤金娜，生物学家卡纳耶夫等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，听巴赫金开设的哲学、美学、文学讲座。

^① 见巴赫金：《语言创作美学》，莫斯科，艺术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404页。

巴赫金后来回忆说,在他周围有个圈子,人称“巴赫金小组”,但这并非真正的“组织”。在这个圈子里,他讲过康德哲学,他认为这是哲学中的中心问题,同时也涉及新康德主义者柯亨、李凯尔特、卡西尔等人;作过关于托尔斯泰、索洛古勃、布洛克、维亚切斯拉夫·伊凡诺夫等人作品的报告。这些哲学、文学讲座,蓬皮扬斯基都做有记录(见中文版《巴赫金全集》第4卷)。后来巴赫金说,由于“不合法地讲授这种唯心主义课程”,于1928年12月被捕了。据他讲,被捕后待遇尚可,侦讯人员容许他外出治病,嘱他可继续写作。但于1929年年底不经审讯,就被判刑五年,初判流放北方最严酷的劳改营,后经原高尔基夫人彼什柯娃等人的营救,改判发配库斯塔奈。库斯塔奈气候干热,风沙时起,在这里巴赫金“选择了区消费合作社,当经济师”,写财务报告、填平衡表,讲经济学课,但不能搞自己的专业,也不让去中学教书。1933年虽已“刑满”,无人管他,巴赫金觉得,到处都像库斯塔奈一样,也乐得“定居”下来。他的好友不断为他邮寄他所需要的图书资料,使他在1934年至1935年间,写完了《长篇小说话语》。1936年巴赫金应梅德维杰夫之约,跑到萨兰斯克,被邀进师范学院教书。1937年周围又是到处抓人,9月辞职,随后“溜走”,只得来往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,借宿亲戚家里。由于当局规定,刑事犯人刑满不能再迁返莫斯科,所以巴赫金无法报上户口,只得在莫斯科附近的萨维洛沃市落脚。1938年骨髓炎大发,真是雪上加霜,2月截去了一腿。四十年代初,巴赫金穷极潦倒,已靠亲友接济过活,但仍在读书写作,写成了《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》、《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》、《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》、《史诗与长篇小说》等。整个战争期间,巴赫金一直住在萨维洛沃,在一所中学教德语,1940年就完成

了关于拉伯雷的创作的学位论文写作。战后巴赫金将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,申请学位。一些评委大为赞赏,一些人极力反对,最后只被授予了副博士学位,但这也大大改善了巴赫金的生活。同时旧友建议巴赫金去萨兰斯克教育学院任教,于是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65年退休。1971年年底,一直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叶琳娜·阿列克山大洛夫娜病逝,而到1972年7月底,经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意外“干预”,77岁的巴赫金才算落了莫斯科的户口。

巴赫金的被发现是在五十年代后期。当时有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到了巴赫金。而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青年研究人员柯日诺夫,读到了巴赫金的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》一书,并在该所档案资料部门查阅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《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》。他感到前者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是最有分量的著作,而后者的不同凡响的观点,使他大开眼界,深为惊讶。于是多处打听,巴赫金何许人,今在何处?得到的回答是,此人早被流放,或许已客死边地。不过最终得知,巴赫金现在执教于萨兰斯克的摩尔达瓦大学。于是遂有1961年6月的会面。是时,柯日诺夫为了淡化会见老人时会产生沉重的印象,邀请同行鲍恰罗夫和加契夫同行,造访巴赫金。巴赫金其时年届65岁,生活虽已不算清贫,但家里陈设简陋。三人站在巴赫金面前,立时感到他身上的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凜然而立的学人风格。巴赫金知道也遇到了理解自己的知音,不过已处事不惊,交谈一开始就说“你们要注意到,我可不是文艺学家,我是哲学家。”^①而在十五分

① B. 柯日诺夫:《关于巴赫金的个人命运》,《对话 狂欢 时空体》,萨兰斯克,1991年第3期,第110、111页。

钟后,天性直爽的加契夫已跪在巴赫金面前,嘴里说着:“米哈伊尔·米哈伊洛维奇,生活可好,在经历了种种考验之后,还是这个样子,您怎么样了?”在这种场合,其他人自然也不能自持。最后建议巴赫金尽快修订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,争取再版。

会晤使双方各自产生了强烈的印象。就三个年轻人来说,老学者的命运使他们不胜唏嘘,同时又看到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学术个性,一位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、见解独到、著述丰富的理论家。对巴赫金来说,他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写了大量的论著,由于命运不济,而只好将它们尘封于储藏室。他认为他的“一切都已完了”,如今他已安于现状,在某种程度上已认可这种定局了;可是突然一切重又开始,而在他这个年纪,重新开始可并不那么轻松^①。他觉得,让他修订旧著再版,“这事未必会有什么结果”。不过,巴赫金还是进行了修改工作。经过柯日诺夫的一番斡旋,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》修订后更名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》于1963年再版。可关于拉伯雷的论著的出版呢?巴赫金信心仍是不足,一改再改。柯日诺夫从他手中夺过手稿,多方施计,甚至发动了一场签名运动,才使得《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》于1965年正式问世。不管这些著作引起争论和发生什么影响,巴赫金第一次被发现了。

巴赫金两书的出版,引起了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注意。他们发现了苏联的形式主义文论,曾把它们译成法文出版。现在看到巴赫金的著述,以为他的论说可使他们的理论得到更新,可以有力地支持结构主义文论的观点,于是将它们译成法文,介绍过去。巴赫

^① 巴赫金给柯日诺夫的信,1961年7月30日,《莫斯科》,1992年第11—12期。

金的著述很快地在西方文论界传播,不想苏联还有这样论述西方文化而见解独到、论说精深的著作。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解构中世纪专制的官方文化的“狂欢化”理论,使得西方学者大为倾倒,不少派别的学者纷纷前来攀附。这样一来,巴赫金在国外竟名声大振。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,巴赫金的旧作、新作时有发表。1975年,在80岁的巴赫金逝世那年,收集了不同时期的论文,结集《文学美学问题》出版;但巴赫金本人却未能见到;1978年,由鲍恰罗夫编选的《语言创作美学》出版。同时二十年代的几本用友人名字发表的著作,包括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》,相继译成英文,在国外刊行。至此,在苏联围绕巴赫金关于文艺学、符号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时,西方学者不仅在大谈巴赫金的“主体间性”,并且对其文化理论进行着相当深入的研究。这样,巴赫金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大,成了第二次发现。

八十年代,巴赫金的著作不断被整理出来,上面提到的二十年代用友人姓名出版的几本著作,一时议论纷纷,不断对它们考订。1986年,他的从未面世过的有关“伦理哲学”的论文,被取名为《论行为哲学》发表出来。同年,由鲍恰罗夫与柯日诺夫合编的巴赫金的《文学批评文集》出版。1984年,美国学者克拉克与霍奎斯特合著的《米·巴赫金》出版,此书声称“在西方的人类学家、民俗学家、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,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”,认为巴赫金的工作最接近于“哲学人类学”^①。在苏联,关于对巴赫金的方方面面的认识,不断扩大,多从各个方面去探讨,但较多的是从文学理论方面。有的认为巴赫金是东正教的宗教家,有的

① C. 克拉克、M. 霍奎斯特:《米·巴赫金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1、10页。

则认为他是革命的先锋派。九十年代,巴赫金的一些论文笔记、书信不断在刊物上登载出来,同时鲍恰罗夫与柯日诺夫的一些回忆性的文章,披露了许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事实,澄清了不少问题,对推动巴赫金的研究极有帮助。巴赫金终于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,他的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,在前苏联不断得到展示,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。对于巴赫金来说,他写文艺学著作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,他写它们,为的是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,因为环境不容许他将自己的思想,通过通常的哲学形式加以表达。这就是为什么生前他一再称自己不是文艺学家而是哲学家的原因了。在西方哲学家中间,如海德格尔、萨特、伽达默尔,也常用文艺或文论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,但那是一种个人嗜好,一种欢快的写作,是哲学中言论转向的产物。而对于巴赫金来说,文艺学多少是种隐蔽的选择,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,但由此却给当代哲学增添了一种独特的体裁,同时又提出不少新鲜命题,大大地丰富了文艺学。1988年,笔者曾在莫斯科等地进行学术访问。在列宁格勒,苏联文艺理论家伊耶祖依托夫和我谈起巴赫金时讲了一个小故事:一位列宁格勒的研究生与一位院士谈到巴赫金的学术地位时,这位院士做了一个比喻:你现在是研究生,我是院士;要是我是研究生,那巴赫金就是院士。这可能是个民间传说,但对巴赫金的学术地位,描写得相当真切。实际上,巴赫金不但不是院士,甚至连教授、博士的头衔都没有。有人曾劝巴赫金去申请教授职称,巴赫金对此十分淡漠,至死不过是位语文学硕士而已。但是巴赫金作为一位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,昂然而立。这是巴赫金的被第三次发现。

一些论著的著作权问题

大约七十年代开始,不少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,对几本巴赫金的文艺理论著作的真正的作者问题,进行了持久的讨论。这些著作就是原来出版于1927年署名沃洛希诺夫的《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》,出版于1929年的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》,于1928年署名梅德维杰夫的《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》。还有一些论文,如署名梅德维杰夫的《学术上的萨利耶里主义》、书评《维克多·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论》、《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》、《伊奥兰特·涅夫里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》、《缺乏社会学的社会学观点》等;有署名沃洛希诺夫的《在社会学的彼岸》、《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》等;还有署名卡纳耶夫的《现代活力论》等。

七十年代中期以前,苏联文艺界早就得知,巴赫金就是上述论著的作者。例如,柯日诺夫在六十年代初,就从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、文艺学家别尔科夫斯基、什克洛夫斯基等人那里得知,《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》和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》出自巴赫金之手。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,在二十年代末读到沃洛希诺夫的著作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》,过后曾对作者说:“想不到在你身上还藏着一位语言学家”,意为沃洛希诺夫过去发表的论著并不如何高明,此书却写得如此精深,这一评语实际为圈中人所知。但如何证实却遇到了一些困难。照理说,巴赫金在世时此事不难解决。但从六十年代开始,巴赫金就回避此事。例如,1960年11月26日在给柯日诺夫回信时说:“《形式主义方法》和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》等书我很熟悉。B. H. 沃洛希诺夫和 П. H. 梅德维杰夫

都是我的故友；在撰写这些书的期间我们在创作上有过密切的接触。不仅如此，语言和言语作品的共同的观点，奠定了这些书以及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著的基础。在这方面，B. B. 维诺格拉多夫完全准确。应该指出具有共同的观点和创作上的接触，并不贬低其中每一部书的独立性和才华。”^① 1973年初，当巴赫金接受维克多·杜瓦金的录音采访时，还在说：“我有个亲密的朋友，是瓦连京·沃洛希诺夫。他是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》的作者，现在这本书可说有人要归于我的名下。”^② 虽然这一谈话内容直到九十年代才公布出来。这就是说，巴赫金在七十年代初对几本书的著作权是有保留的，而且是不大愿意谈论的。

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白银出版社对巴赫金的著作权，作了追踪式的辨析。从七十年代开始，苏联文艺界人士在公开的文章、讲话中，不断提到巴赫金和上述著作的关系。有时含糊其词，例如1970年莫斯科大学为巴赫金75岁生日举办的纪念会上，O. 列夫济娜在总结的短文中说：“在二十年代末，M. 巴赫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……这些思想反映在当时的一系列出版物之中”。但在短文的注释中，所指的“一系列出版物”就是上面提及的梅德维杰夫和沃洛希诺夫的三本著作。这一说法，看来不无根据，不是任意说说的，它至少说明巴赫金领导过这些著作的设计，或参与了这些著作的写作，而且扮演了主要的角色。有时则说得相当明确，如同在这个会上，与晚年的巴赫金甚为接近的B. B. 伊凡诺夫，在报告中提到，这些署了梅德维杰夫与沃洛希诺夫姓名的著作，实际上系

① 巴赫金给柯日诺夫的信，1991年1月10日。

② 《巴赫金访谈录》，见杂志《人》，1993年第4期—1995年第1期。